

一 诗以言志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中，涌现出无数杰出的诗人，创作了难以计数的优美诗篇。“诗言志”是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历代诗人都把“诗言志”视为指导自己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些诗歌表达了不同时期中国人的愿望与志向，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欣赏这些诗歌对我们陶冶性情、提高审美品位，具有积极的作用。



《诗》三百篇思无邪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本叫《诗》，共有诗歌三百零五篇（还有六篇有题目无内容，称为“笙诗”），取其整数，称为“诗三百”。《论语·为政》有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中国文学之光辉起点

中国诗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但是一般把编订于春秋中叶也就是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诗经》看作我国诗歌史的起点。

《诗经》主要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 11 世纪至前 6 世纪）的古代诗歌，作品的时间跨度为五百多年，这些诗歌是如何汇集在一起的呢？传统的《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诗的采集途径有“采诗”和“献诗”两种。据古代典籍记载，古有所谓“采诗之官”，专门于民间搜集诗歌，献诸朝廷，作为统治者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所谓“献诗”，是指统治阶级中的贵族文人，有目的地作诗以献于王，意在补察时政。相传，孔子曾将采、献来的三千多篇诗去糙取精，整理成集，就剩下了三百零五篇。

文化链接

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

——《汉书·食货志》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国语·周语上》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史记·孔子世家》

《诗经》在周代作为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被广泛地应用于祭祀、朝聘、婚礼、宾宴等各种典礼仪式,又是贵族学校中的一项教学内容。春秋时盛行赋诗言志,诗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学诗、用诗是贵族成员必备的技能。孔子创立私人教育,把《诗》作为主要传习对象。此后,儒、墨等学派都经常在言论著作中引《诗》。秦火以后,《诗》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从内容上看,《诗经》集中表现了古人丰富的感情生活和对社会政治的独到见解,从整体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从形式上看,《诗经》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古人为了增加诗歌的生动性,在句法和章法上运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

《诗经》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形成。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借《诗》以言志

在周代,《诗经》的使用范围很广泛,除了用于娱乐、教化之外,还具备很重要的社会语言功能。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由此不难看出《诗经》在当时社会语言中的模范地位。

古人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吟诵《诗经》中的篇章,或者引用《诗经》中的某些句子,以此表达个人的政治诉求或思想情感,此即所谓“赋诗言志”。值得注意的是,《诗经》常常作为承载着特殊意义的社交语言范本,在不同的场合被加以使用。

《诗经》可以用来讽谏,使用委婉规劝或大众舆论的方式表达下级对高层的政治诉求,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这是《诗经》作为社会交际语言的重要用途之一。在信息传递不发达的古代,这也是一种非常经济的以舆论干预政治的手段。

《诗经》的语言还经常成为上流社会的社交语言规范。将《诗经》的语言用于上流社会交往的现象在周代非常广泛而活跃,《诗经》常在接待他国来使等正式的社交场合被引用,这也正说明了《诗经》作为一种社交语言体系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论语》记载了孔子对《诗经》语言交际功用的评说:“诵《诗》三百,授之以

知识名片

孔子对《诗经》的评说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从中不难看出借《诗》言志在当时上流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古人还经常以《诗经》作为辩论的理据。在国家关系紧张的古代，国与国之间使节往来，纵横捭阖，辩论风靡一时。辩论时，辩论双方可以直接将《诗经》中的语句作为论据加以引用，表明自己的立场。

丰富多样之内容

《诗经》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这五百多年间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周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变化过程。作品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既有祖先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间的宴饮交往，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以恋爱、婚姻为主题或描绘社会习俗的动人篇章。

《诗经》按“风”“雅”“颂”分类编排。《风》包括十五国风，犹如今天的地方“土乐”，分别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收诗一百六十篇。《雅》是王畿之乐，是相对于地方“土乐”而言的“正乐”，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章，是祭神、祭祖时所用的歌舞曲。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

《风》《雅》《颂》三部分诗的精华在十五国风 and 《小

雅》之中,《大雅》和《颂》主要体现的是史料价值。《诗经》的诗按思想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周族史诗。《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文王》《大明》六篇作品被认为是周族史诗。它们语言简朴,却用粗线条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周王朝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史迹,可以看作周王朝的史诗。这组史诗具有相当高的叙事水平,有较多的场面描写,塑造了古代创业的英雄人物形象,歌颂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和无穷的智慧。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真正的史诗屈指可数,因而《诗经·大雅》中保存下来的这一组史诗就显得特别珍贵。

农事诗。周代经济以农为主,因而反映农业生产和劳动生活的农事诗在《诗经》中为数不少。《雅》《颂》里的农事诗,大多赞颂农业所取得的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表达了祈求丰年的愿望。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农事诗中的杰出作品,当推历代传诵的《豳风·七月》。它以时序的更替为主线,描绘了劳动者一年到头的劳作景象,以连续性的形象画面,具体全面地描写了我国商周之际农业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征役诗。广大劳动者除了劳动成果被统治者掠夺之外,还要经常被驱使着去当兵打仗和服各种徭役,经年在外,四处奔波,忍受痛苦的煎熬。《诗经》中反映这方面内容的诗篇又可分为“征夫诗”和“思妇诗”两类。征夫诗直接反映服役者的痛苦遭遇和怨愤情绪,代表作品有《小雅·何草不黄》《唐风·鸛羽》《小雅·采薇》《豳风·东山》等。外有征夫,则内有思妇。一些思妇诗通过

描写妻子对久役在外的丈夫的担忧和怀念，从另一侧面控诉了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等。

怨刺诗。《汉书·礼乐志》：“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诗经》中怨刺诗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当时政治的黑暗与腐朽，讽刺统治者生活中的一些丑恶行为。它包含两种阶级性质不同的作品，一种是国风中的讽刺性民歌，另一种是《大雅》《小雅》中的贵族讽喻诗。前者大都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以非常尖锐、辛辣的笔触，揭露统治者的种种丑恶行为，将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后者是贵族士大夫对掌权者昏庸误国表示不满，反映社会动乱，暴露政治弊端，并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劝谕统治者任用贤良，改革政治，对现实的反映有一定的深度。我国文学史上后来的许多文人讽喻诗，大都与《诗经》中这部分写怨刺内容的讽喻诗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爱国诗。《诗经》中有些诗歌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无畏的英雄气概。如《小雅·采薇》中的主人公，舍其室家，抵御外侮，“不遑启居”“载饥载渴”，但他明白，这一切都是猖狂的猃狁侵袭之故，为了保卫家园，他不得不奋起战斗，做出牺牲。这位戍卒既恋家也识大局，不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此诗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热情。再如《秦风·无衣》，可说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战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这首诗表现了当时人民同仇敌

气、勇抗外侮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歌颂了奋起捍卫祖国、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精神。《诗经》中的爱国诗或沉郁悲慨,或细腻委婉,虽格调不同,但都充满了爱国激情。

婚恋诗。所谓“婚恋诗”,即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诗篇。《诗经》中的婚恋诗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艺术质量甚高。无论是“男悦女之词”,还是“女惑男之语”(朱熹《诗集传序》卷四);也无论是表追求,抒思慕,叙幽会,寄怀念,还是描述爱情、婚姻的悲剧,抒发内心的哀痛等作品,其所表现的思想感情都是十分纯朴、真挚、热烈、健康的。



《诗经》描写的上巳节中男女相会的情景

垂范千古之表现手法

《周礼·春官》写道:“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这里的“六诗”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后人将赋、比、兴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同风、雅、颂一起被称为《诗经》的“六义”。赋、比、兴的运用,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对构造诗歌意象、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也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诗人把思想感情及与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它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其中《国风·七月》

就是典型的代表,具体地、层次分明地、对比地叙写了劳动者的农业劳动及生活情况,也反映了贵族的腐化享乐生活,揭露了其剥削本质。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或比拟。以物比人,以人比物,以物比物,是“比”手法的基本特色。《诗经》中的优秀民歌,运用比喻(明喻、暗喻、借喻)的手法,是很常见而且很灵活圆熟的,如《魏风·硕鼠》,以大老鼠来比喻贪婪剥削人民劳动果实的统治阶级,是作者对统治阶级的辛辣讽刺和无情鞭挞,通过比喻表达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古代的劳动者,面对黑暗残酷的社会环境,深陷苦难的罗网,不能畅抒胸臆,直刺丑类,只有采取隐喻曲折的比喻手法,巧妙、尖锐地讽刺统治者,并发出久久埋藏在内心的怒火。“比”的表现方法,充分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做铺垫。《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这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了诗歌艺术境界不可或缺的部分。“赋”和“比”是多数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中比较独特的手法。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感兴趣,翻陈出新,形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由《诗经》开创的赋、比、兴手法，就是形象思维的方法，它影响深远，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比、兴之法，影响尤为深远，它开辟了后世文学所谓“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艺术表现手法。自屈原吸收、发展了比兴手法后，比兴手法经后人的不断发展创造，已不单纯是一种简单地以某物作比或触物起兴的表现手法，而且是诗人进行艺术构思和形象思维的重要艺术手段。



文化链接

《诗经》中很多作品都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并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如《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影响深远之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性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无比的历史画卷，其中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是开后世现实主

义诗风的先河，在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化历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

《诗经》的现实主义还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由于《诗经》作者的身份、地位、境遇不相同，他们又都处在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社会客观现实使他们自生情感，用诗歌来表现现实是他们抒发情感的最好形式。《诗经》的作者大都不是专业诗人，但他们都特别关注现实社会人生，他们的歌唱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来自生活实践，是对生活实践的真实感受，是对生活百态的思考和评论。

《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首推国风中的民歌，其次是《大雅》《小雅》中的文人讽喻诗，这些诗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纵观国风一百六十篇，多是出于对现实的感受和思考，以及发自内心的真情挚语。如《东山》《无衣》是谈平乱、御侮的，《绸缪》是叙新婚的，《采芣》是写劳动欢乐的，《羔羊》是讽刺贵族生活的，《黄鸟》是批判殉葬的，《击鼓》是反映厌战的，《硕鼠》是反对横敛的，《伐檀》是斥责贪污的，《新台》是讽刺荒淫无耻的，《素冠》是表达同情不幸的，等等。可以说国风的作者通过自己的心灵感受，真实、大胆、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各个层面，展开了当时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画卷。

《大雅》《小雅》中的讽喻诗，大多出自贵族阶层中有忧患意识的文人之手，是公卿列士的讽喻劝谏之作，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等，《小雅》中的《节南山》《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等。这些诗歌或揭露丑陋现实，或直刺时政之弊，或叙述不幸遭遇，或抒发

愤懑之情,均饱含诗人强烈的爱憎情感,具有很强的批判力量。另外,这一类作品大多以哀怨起,以哀怨终,表现出一种深陷苦难而无法自拔的无奈,直接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有忧患意识的文人的心理状态。《诗经》作者不仅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关注社会,而且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深刻揭示出社会的弊病,记录了苦难的人生经历。

《诗经》所展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两汉乐府民歌、建安时代的文人诗歌、北朝民歌、唐代杜甫的诗歌作品、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宋代以王禹偁作品为代表的“白居易体”诗歌、金元之际元好问的诗歌等,都是对《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诗经》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千百年来启发和鼓舞着后世文学家。可以说,《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屈子楚辞忧君国

楚辞，是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以南方民歌为基础，采用楚国方言创作的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屈原是楚辞的奠基者和代表作家，他在其作品中表达了对楚地楚风的眷恋之情以及忧君思国的爱国情怀。

齐日月光之屈子

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屈原的许多政治主张和锐意革新的思想对战国时期楚国的内政外交影响很大。但屈原为人性格耿直，因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再加上受秦国使者张仪贿赂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楚怀王的宠妃郑袖等人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并将他逐出郢都。楚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公元前 278 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他以死明志，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



文化链接

屈原与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端阳、重五。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但今天端午节的众多活动都与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有关。

传说,屈原投江殉国的日子正是五月初五。屈原投江后,沿江百姓不忍屈原尸体被蛟龙所吞食,便造龙舟竞捞,并将粽子投入江中,鸣锣擂鼓驱赶蛟龙。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活动便逐渐演化成今天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等风俗。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诸多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这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作为政治家,屈原横遭迫害,是一位悲剧人物;作为诗人,他那极端不幸的遭遇、忧国忧民的意识、刚正不阿的品格,促使他写下许多不朽的诗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



屈原行吟

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认为屈原所作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共二十四篇。至于《渔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持两可的态度;还有《招魂》一篇,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明确说为屈原所作,却被王逸归在宋玉名下。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如《离骚》;第二类是屈原根据楚国当地神话、传说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如《天问》;第三类是楚国原有的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如《九歌》。

纵观屈原的作品,主要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美政”理想,发愤且抒情的思想贯穿于屈原后半生的大部分作品之中。屈原将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乃至整个生命熔铸成宏伟诗篇,作品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很多作品是动情以赋诗,赋诗以言志,体现了屈原崇高的人格。

屈原的作品中充满奇幻的想象,他通过幻想、神话等描绘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为后世浪漫主义诗人所取法。同时,他的作品语言生动活泼、华丽自然,表现出与北方文学截然不同的特色。此外,屈原作品在诗的体制、形式、表现手法方面也给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被赞誉“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屈原被公认为中国诗歌之父。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浪漫主

义诗歌的奠基人,被评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无论是人格品质还是对后世的影响,屈原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可以与日月齐光的人物。

楚辞的浪漫与神幻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诗歌体裁,即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时期,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了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录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作品,称为《楚辞》。

楚辞这一诗苑奇葩,是伟大诗人屈原在楚地巫鬼文化与中原礼乐文化相交融的基础上,汲取民间文学的养料而“自铸伟辞”的天才创作,它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更重要的是楚国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